

发展经济学 前沿理论研究 (上册)

Fazhan
Jingjixue Qianyan
Lilun Yanjiu

马颖 主编

发展经济学 前沿理论研究

(上册)

Fazhan
Jinglixue Qianyan
Lilun Yanjiu

马颖 主编

责任编辑:陈 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马颖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发展经济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3023-1

I. ①发… II. ①马… III. ①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 IV. ①F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7271 号



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

FAZHAN JINGJIXUE QIANYAN LILUN YANJIU

马 颖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56.5

字数:1104 千字

ISBN 978-7-01-013023-1 定价:120.00 元(上、下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武汉大学马颖教授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由主编及十多位合作者历经6年多时间协手完成的著作对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取得新进展的各主要领域做了全面的概括和评价。一个学术团队沉下心来对一个学术领域潜心研究了6年,这一方面表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哪怕是研究和评价他人的著述,只要认认真真去做就会是一件耗费时日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个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值得一个学术团队花上6年时间去进行梳理和消化,这本身就说明这个学术领域中涌现出来的研究成果内容颇为丰富,值得一个学术团队去对它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钻研和评析。

长期以来,我一直不认同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已经走向衰落或消亡的学说的说法。这类说法的理由大致是,发展中国家各有差异,没有一种宏大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加以概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接受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具有片面性的政策建议而陷入困境,因而发展经济学早该“寿终正寝”了;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在消除其早期理论片面性的同时也使发展经济学失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等等。我认为,发展经济学因为广大发展中国的存在而成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上除OECD发达国家之外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在继续发展。此外,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基础乃至文化传统方面有着很大差异,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所经历的不同的经验教训还有待继续总结。所有这一切都构成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存在的基础,是这门学科取之不尽的丰富源泉。所谓的发展经济学“贫困论”或“衰亡论”,如果不算是谬论,也应当算是误解。

马颖教授与他的学术团队总结和评价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领域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大量的事实有力地反驳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亡的说法。通过对《研究》一书的阅读,人们根本无法得出发展经济学走向“贫困”或“衰落”的结论,相反,发展经济学正处在自它问世以来未曾有过的全面繁荣的时期。通览全书,我觉得本书的特色和新意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近年来发展经济学所取得的新进展做了颇为全面而清晰的概括和梳理。《研究》一书是在参考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数百位发展经济学家发表的数百篇著述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内容涉及扭曲理论、对直接非生产性活动的研

究、制度与经济发展、分成租制、要素联结等非正规制度与经济发展、家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新贸易理论、新一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金融发展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新进展、对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等发展经济学取得新进展的所有重要领域。此外，为了能够在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中厘清思路，进而能够清晰地概括出发展经济学前沿的理论轨迹，本书作者在全书各章的编排上颇费匠心。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二章至第六章为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对市场效率与经济发展、市场不完善背景下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户以及作为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所开展的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兴起“新古典复兴”以来出现的纠正发展经济学早期阶段因强调发展中国家特殊性而带来的片面性的理论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向重视政治、法律和历史等因素作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的理论倾向。第二部分由第七章至第九章所构成，梳理了近年来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从规模收益递增假设出发对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经济地理学这三大领域所开展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力图突破传统新古典理论规模收益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对经济发展理论所施加的约束，进而促使经济发展理论进一步朝着动态化方向推进所取得的新进展。第三部分涵盖了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对发展经济学近年来一直在持续取得新进展或沉寂一段时间后再度取得理论推进的三个领域进行了概述，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对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及人口流动理论。

其次，对发展经济学各个领域新进展的理论贡献做了富有新意的解读和评价。譬如，本书作者指出，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讨论市场效率与经济发展关系时用“帕累托更优”或“帕累托更劣”概念取代“帕累托最优”概念，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对“帕累托更优”或“帕累托更劣”讨论所依据的是市场不完善假设而不是传统的完善市场假设，从该假设推导出的“多重均衡”往往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作者把对分成租制、要素联结等非正规制度与效率相互关系的探讨视为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为构建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进行的尝试，认为探讨分成租制有助于理解发展中国家农业中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替代而产生的激励等功能，而要素联结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功能不仅在于它使孤立的未被利用的生产要素联结在一起并促成外部性内在化，而且还在于要素联结使得在某个市场蒙受的损失可以由其他市场的收益来补偿，进而突破了传统新古典范式把配置效率与收入分配分隔开来进行研究的藩篱。又如，作者认为新增长理论虽然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发明具有收益递增性质的视角把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现有研究成果离解释清楚这一机制还有很长的距离。此外，作者还指出新增长理论仍带有“欧洲中心史观”的痕迹。新增长理

论要想对人类社会长期增长做出回答，不仅要回答西方社会如何从停滞走向增长的，还需要解释西方国家之外的国家何以仍然陷入贫穷落后泥潭的原因。在评析金融发展理论的贡献时，作者写道，基于非对称信息的信贷配给理论虽然为阐述信贷配给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微观基础，但由于其分析对象是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和借款者，将发达国家信贷市场上行为主体的决策机理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中的信贷配给现象，其适用性值得怀疑。在本书中，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被理解为对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为何产生了企业微观层次上的收益递增以及收益递增与运输费用、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做出了新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被用来探讨发展与不发展问题。但新经济地理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例如，当论及“中心—外围”关系时提到了一些阻碍集聚的成本因素，但其他非经济因素却未提及，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有很大偏离。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相互作用促成了区域集聚的形成。

最后，对发展经济学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于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来说，无论是概括发展经济学70年的演进历程也好，论述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也好，都会碰到一个无法避开的理论难题，这就是“新古典主义复兴”与发展经济学演进的关系。在本书中，作者就“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哪些方面推进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步这个问题集中展开了论述。为此，作者集中对一批被称作“新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新一代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在认真考察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基础上，不仅批评和纠正了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过于强调物资资本、计划化、进口替代和工业化而忽视人力资本、市场机制、农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倾向，而且对传统新古典理论范式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修正，这包括以不完善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代之以完全竞争导致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公理性假设，把传统的信息完善假设转换为信息不完善假设，以“制度内生”假设取代“制度给定”假设，恢复更为现实的收益递增假设的主导地位以取代规模收益不变假设的主导地位，重提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适度干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新古典主义复兴”使得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突破了自身的藩篱，朝着贴近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增强了发展经济学的包容性和解释力，促使这门学科在理论体系上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框架内继续发展。作者的这些见解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现实和阅读大量文献并经过深入思考而得出来的，因而具有其独到之处。

当然，作为一部全面概述和评价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著作，本书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如在篇幅上可以适当精简一些。但就总体而言，本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结构严谨、论述清晰、富有新意。此书虽然不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评述发展经济学新发展的著作，但却是一部全面梳理、研究和评价发展经济学

前沿理论的佳作，这也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团队为推进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一大贡献，值得向大家推荐。同时，我也期待着这支学术团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团结奋进，再接再厉，在未来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谭' and '谦',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3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	(1)
第二节 对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解读和评价	(22)
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38)
第四节 发展经济学为什么没有衰落	(58)
参考文献	(71)
第二章 市场效率与经济发展	(85)
第一节 扭曲理论	(86)
第二节 寻租理论	(110)
第三节 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122)
第四节 信息不完全与市场不完全背景下的市场效率	(137)
第五节 简要的评价	(158)
参考文献	(166)
第三章 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背景下的经济发展	(172)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173)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	(207)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分成租制	(229)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背景下的要素联结	(266)
第五节 简要的评价	(299)
参考文献	(310)
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农户经济学	(315)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农户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型	(316)
第二节 农户内部的人力资本形成	(329)
第三节 农户内部成员营养不良与生产率	(337)

第四节 简要的评价	(346)
参考文献	(347)
第五章 制度与经济发展	(350)
第一节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	(351)
第二节 分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思路	(363)
第三节 历史上的制度变迁	(366)
第四节 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计量与统计分析	(383)
第五节 简要的评价	(393)
参考文献	(397)
第六章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	(402)
第一节 社会资本理论概述	(402)
第二节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理论模型 ...	(406)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经济绩效：制度分析的视角	(415)
第四节 对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经验研究	(435)
第五节 简要的评价	(439)
参考文献	(443)
第七章 从新贸易理论到新一新贸易理论	(447)
第一节 新贸易理论的问世	(449)
第二节 新贸易理论的其他主要模型	(460)
第三节 新贸易理论在经济发展领域的运用	(489)
第四节 微观企业异质性与外贸产业发展	(500)
第五节 简要的评价	(522)
参考文献	(525)
第八章 新增长理论	(530)
第一节 新增长理论的兴起	(530)
第二节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537)
第三节 分工与经济增长	(564)
第四节 资本积累、投资与经济增长	(577)
第五节 国际贸易、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582)
第六节 增长与趋同	(600)
第七节 简要的评价	(611)

参考文献	(616)
第九章 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新经济地理学	(622)
第一节 从杜能、佩鲁和缪尔达尔到新经济地理学	(622)
第二节 中心—外围模型	(633)
第三节 城市结构	(637)
第四节 集聚与经济增长	(641)
第五节 异质性企业与空间集聚	(651)
第六节 对集聚机制和效应的计量分析	(662)
第七节 简要的评价	(666)
参考文献	(669)
第十章 金融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675)
第一节 金融深化理论的形成与两代人的拓展	(676)
第二节 新结构主义金融发展理论	(701)
第三节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信贷配给理论	(715)
第四节 金融约束理论	(737)
第五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及其发展	(746)
第六节 简要的评价	(754)
参考文献	(761)
第十一章 人口流动理论的新发展	(773)
第一节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中期的人口流动理论	(773)
第二节 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	(774)
第三节 人口流动、社会福利与不平等	(780)
第四节 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	(785)
第五节 对人口流动的迁徙动机和汇款动机的分析	(793)
第六节 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797)
第七节 简要的评价	(803)
参考文献	(805)
第十二章 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807)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起源	(808)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811)
第三节 资源约束、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	(822)

第四节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833)
第五节 贸易与可持续发展	(841)
第六节 制度与可持续发展	(850)
第七节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856)
第八节 简要的评价	(868)
参考文献	(872)
人名译名索引	(875)
后 记	(893)

第一章 导 论

这是一部研究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的学术专著。何谓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顾名思义，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主要指近年来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在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包括在有关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理论模型、假设前提、分析工具和政策结论等方面的研究中所做的新的推进。为了更好地将本书的研究内容表述清楚，需要首先解释清楚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经历了怎样的演进历程？本书对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做了怎样的解读和评论？怎样看待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为什么没有衰落？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原先遍布亚、非、拉三大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属国纷纷独立，形成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从理论上对这一大批在政治上赢得独立并急于在经济上谋求发展的新生国家提供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指导，成了整个经济学界面临的一项全球性任务。当时的背景是，曾经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公认为在 1850 年至 1950 年近 100 年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在现有的经济理论中能够同不发达国家沾上边的所谓“殖民经济学”，不过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者和殖民地官员各种著述的拼凑而已。这就使得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考虑开辟出一门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当时，一些出生于殖民地或附属国但在西方国家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已经开始了对本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战争结束前后意识到欧洲的经济重建时代即将到来以及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将面临紧迫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表现出重振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浓厚兴趣；此外，部分在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供职的研究者由于工作

性质而涉足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政策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三股力量相互交织之下,一门主要研究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崭新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发展经济学这门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迄今经历了近70年的成长历程。可以把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阶段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为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一阶段。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公认,由保罗·N. 罗森斯坦—罗丹(Paul N. Rosenstein-Rodan, 1943)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问世,同时也意味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①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那篇文章中,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过剩农业人口”、“社会分摊资本”、“货币性外在经济”和“技术性外在经济”概念以及在几个有互补关系的工业部门实施有计划的工业化的思想。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 Mandelbaum, 1945)则在就人口稠密和经济落后的东南欧地区建立一个数量模型的尝试中,分析了这类地区人口过剩、工业化不足和“大规模农村伪装失业”现象之间的关联,主张政府实行广泛干预,以刺激消费和加速资本形成。张培刚(Pei-kang Chang, 1949)在他撰写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指出,农业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就应该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国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数目增多,经济发展问题的紧迫性迫使这门新兴学科在它刚刚诞生不久便跨入了大规模推进的繁荣时期。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 1950)和汉斯·W. 辛格(Hans W. Singer, 1950)在各自发表的论文中批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有关各国生产率相同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将在各国间分配的假设与现实不符,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命题,认为这种长期恶化趋势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通过保护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他们的论述被西方学者合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

W. 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 1954)提出的二元结构模型是这一阶段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型之一。他在接受古典学派“维持生存工资”水平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将经济发展解释为伴随着扩张的资本主

^① 有关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路的分析,参见马颖:《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第24—37页。

义部门不断地从传统部门吸收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剩余劳动的过程。同古典学派一样,刘易斯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他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旨在为那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不适合的国家(如亚洲国家)设计一个分析框架,以便说明通过使用剩余劳动来创造资本和推动经济发展。

20世纪50年代,另一个对发展经济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成果是罗森斯坦—罗丹(1957)在他1943年论文基础上作了完整阐述的“大推进”理论。在他看来,新古典理论最薄弱之处是其投资理论,分散的个人投资不可能达到最佳资源配置;与此同时,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市场更加不完全(例如不可能存在完善的适合所有商品的期货市场,等等),其生产函数的构成中所具有的不可分性会产生外部经济、递增收益和规模经济,导致价格机制不能给出最适度解所要求的所有信息。这两方面原因决定了不发达国家必须促成“大推进”式的工业化,使工业化达到足够大的规模,犹如飞机升空之前有一个必须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一样。

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 1953)受亚当·斯密有关“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这一命题的启示,认为要想促成不发达国家突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促成平衡增长,即全面投资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克服不同产品的供求弹性差异,为其他行业新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并引诱新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初哀叹发展经济学衰落的阿尔伯特·O. 赫尔希曼(Albert O. Hirschman, 1958),在50年代时曾经因阐释不平衡增长理论而成为发展经济学舞台上的一员主角。他当时提出了包含“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在内的“联系效应”概念来论证不平衡增长,证明发展中国家产业间(尤其是农业及相关部门)联系效应很弱,相对而言,进口替代工业的联系效应较强,所以,应优先发展这类部门。

在第一阶段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发展理论,还有探讨长期增长问题的哈罗德—多马模型,霍利斯·B. 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 1962; 1966)有关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受“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的“两缺口”理论;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55)对增长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变动的分析以及对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均等趋势的“倒U曲线”的分析;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956; 1957)用“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对不平等问题的探讨;理查德·R. 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 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 1957)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等等。

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演进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该思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典学派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传统,在理论建构上表现出追求“宏大”理论的倾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和进口替代,核心是突出计划化的重要性。哈罗德—多马模型、“大推进”、“平衡增长”、“两缺口”等理论为计划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线性规划和动

态规划的最优化技术、投入—产出分析等数学工具被用来解决计划配置中的技术性问题。

在同一时期,还有一批秉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传统^①的发展经济学家。他们一方面提出了多种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典型形态为索罗模型、斯旺模型和米德模型;另一方面又同居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展开了论战。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 1952)反驳了有关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主张进口替代的观点,认为至少贸易量的增长或出口实际成本的下降快于出口价格下降等有利效应足以抵消贸易条件恶化,与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还不如把技术进步引进农业,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扩大出口。他还对有关剩余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说提出了质疑,指出可以把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看作因季节变化造成的间断现象,但决不能视为长期存在的现象。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 1959)指出,国际分工和贸易可以提高参与国的经济福利与收入,因而潜在地对经济发展有利。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国际贸易带来的间接动态收益;他还认为,只要农业中存在着改进生产方法的可能性,伪装性失业的说法就站不住脚。

面对这一时期结构主义者对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未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及市场失效原因的抨击和倡导实行计划化的政策主张,哈里·G. 约翰逊(Harry G. Johnson, 1958)和阿诺德·C. 哈伯格(Arnold C. Harberger, 1959)作了回应。哈里·G. 约翰逊指出,在经济史上找不到完全的计划和完全的市场的例证,市场机制可用作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是因为不熟悉市场机制、缺乏信息等原因所致;改革特定市场,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更加接近于理想形态的市场。哈伯格对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国家因实施计划化引起资源配置不当的主要根源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重新配置现有资源以增加国民福利的可能性。新古典主义者对结构主义者的上述回应和批评,成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的先声。

二、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推动着新古典主义研究思路大举向发展经济学各个领域渗透。第一阶段中的结构主义政策导向被认为助长了政策操作中轻视人力资本、忽视市场机制、歧视农业和闭关自守的倾向。那些接受结构主义政策建议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取得较为引人注目的发展成就,但自70年代开始却面临重重困难;与此相反,那些在60年代逐渐实行对外开放和

^① 有关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分析,参见马颖:《论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思路》,载《发展经济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114页。

引入市场机制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西奥多·W. 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1964; 1978）、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 1965; 1971）、贾格蒂什·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 1971）、哈里·G. 约翰逊（1962）、伊恩·M. D. 利特尔等（Ian M. D. Little et al., 1970）、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 1972）、安妮·O. 克鲁格（Anne O. Kruger, 1974; 1977）等人指出，奉行结构主义政策导致了国民经济中价格偏离边际替代率进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这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重重困境的主要原因；“矫正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则是消除扭曲的主要手段。具体而言，舒尔茨等人对第一阶段发展理论和政策倾向做了如下反思：

首先，批评过于重视物资资本的倾向。舒尔茨指出，国民产出增长一直高于物资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人力资本投资则是解释这两者之间差别的主要原因。不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面临困境，是因为新资本没有用在追加人力投资上，致使人力资本无法与物资资本齐头并进，最终降低了物资资本的吸收率，成为增长的限制因素。加里·S. 贝克尔（Gary S. Becker, 1964）则构筑了一个包括生育、教育、健康和劳动力供给与消费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新古典模型。

其次，歧视农业的偏见得到了纠正。舒尔茨把歧视农业的原因解释为前一阶段盛行的“糟糕的”经济学误导的结果，而这种经济学是建立在有关低收入国家农民对价格激励反应迟钝，贸易条件长期恶化造成世界农产品市场长期萧条，穷国农业是增长的负担，其使命是为工业化提供大量资本等推论基础上的。以这些推论为依据的错误政策扭曲了对农业的激励，致使农业中的经济潜力未能发挥出来。

再次，检讨了建立在进口替代基础上的保护政策。这一点被认为是引致扭曲和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拉尔、巴拉萨等对此做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在关税等形式的高保护壁垒之下，大规模进口替代工业因低关税鼓励资本品进口而得以扩张，并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信贷、汇率高估以及公用事业定价过低等补贴中获利，在引致制造业过度扩张生产能力的同时，不鼓励出口，还使相对价格不利于农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最终导致低效率，让国民经济付出了高昂代价。W. 马克斯·科登（W. Max Corden, 1966）等人以“有效保护率”概念分析并估算了实行进口替代国家关税结构的资源配置效应以及反出口倾向的程度，结果显示这类国家不仅保护率水平高得惊人，而且按国际价格计算的增加值为负数。

最后，对计划化及其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和评估。（1）体现计划化具体运作的投入—产出模型被认为依托的是物质平衡体系。该体系忽视了相对价格变动，因而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特尔等人（1970）运用社会机会成本（即影子价格）等成本—收益分析工具评估了计划化中的公共投资项目，分析了被控制

价格未能反映机会成本（即价格扭曲）的程度，并讨论如何对用于公共部门的国内资源成本适度定价等问题。（2）讨论了计划管理体制下的低效率问题。舒尔茨和巴拉萨均认为，计划管理体制扭曲了对经济的激励，究其根源，既同信息传递有关，又同公共部门被施加过重负担有关。安妮·克鲁格则指出，第一阶段中的“市场失效论”诱导人们不再信任市场而过于相信政府能力和计划的功能，因此忽视了市场与价格的激励功能。（3）计划管理体制被认为易于产生腐化，安妮·克鲁格对寻租的分析被公认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克鲁格认为，计划管理体制下对经济活动干预所引发的租金成为合法与非法寻租活动的目标，而与寻租相伴随的往往是贪污、行贿、走私及黑市等非法活动，由此浪费了大量资源，推动追加成本上升，导致福利净亏损并阻碍增长。

这一时期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除了从总体上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演进加以总结和反思之外，还在认真思考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有关早期新古典经济学不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批评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做了重要的修正。这些修正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对传统增长理论的修正

肯尼斯·J. 阿罗（Kenneth J. Arrow, 1962）建构的“边干边学”影响持续增长过程的模型将产出表达为生产经验的函数，技术进步被归结为由生产中学习过程所带来的绩效持续递增的结果。在这个内生增长模型中，由生产经验产生的信息广为传播，而扮演类似于递增收益角色的技术进步则以外部性形式出现。

2. 一改将制度视为给定的研究传统并开始研究制度的作用

事实上，早就起步探索企业制度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1937; 1960）于20世纪60年代初再度提出交易成本问题并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进而思考权利界定和安排对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及经济体系运转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阿尔曼·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Armen Alchian & Harold Demsetz, 1972）则完成了对产权结构、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证明了产权结构的功能在于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的激励。直接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进行探讨的则是道格拉斯·C. 诺斯与罗伯特·P. 托马斯（Douglas C. North & Robert P. Thomas, 1973）。他们采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经济史。他们的结论是：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规模经济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增长的关键在于包括确立产权在内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经济激励作用。

3. 发展中国家的不完善市场及非正式制度开始受到关注

张五常（Chung, Steven N. S., 1969）把交易成本用于分析亚洲地区的分成